

## “文化转向”与文化关联顺应

广东商学院外语学院 曾文雄\*

**摘要:**“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阐释,打开了新视野。通过对“文化转向”的反思,结合关联—顺应理论的思想,我们建立以译者为中心的关联—顺应选择翻译观,从新的视角讨论和解释文化学派的“文化转向”。本文在关联—顺应选择翻译理论框架下讨论了译者发挥能动性去平衡文化两极,取得与原语文化、交际等多维的最佳关联与顺应,策略性地选择语言使用,不断做出译语的优化选择,使译语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文化维度等效。

**关键词:**文化转向 关联—顺应选择 文化翻译

### 1. 引言

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文化与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萨丕尔(Sapir)在《论语言》中指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能脱离社会流传下来,决定我们生活风貌和信仰的总体”,“语言按其本质是文化的”。语言文化层可概括为:物质文化层、典章制度层、行为习俗层、心理活动层(刘宓庆,1999)。翻译行为及翻译的实质是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原语的文化与译语的文化系统是相互交织的。翻译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文化翻译的目的、文本的文化解读、文化与意义的关系、语义文化和篇章文化的诠释、文化的可译性、文化的表现和文化的价值论等等,并在语言信息的解码中传递文化信息,将原语文化中的符号转换成译语文化中的语言符号。刘靖之(载刘宓庆,1999)提出,缺乏文化元素的译文等于缺乏了灵性的翻译;文化元素包括译者对原文的文化背景的修养、理解以及而引致的气质和风格。他把译文看作是“原文+原文文化背景+译文+译文的文化背景+原文作者的气质和风格+译者的气质和风格的混合体”;他认为文化翻译要达到文化的信、达、雅。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预示着翻译研究出现新的倾向与突破。当代译论中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界对译语文化因素的重视达到了空前的地步,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深思,以应对“文化转向”带给译学的挑战。

### 2. “文化转向”与关联顺应翻译模式

翻译传统上的翻译活动一直被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却忽略了翻译活动的社会性、政治性与人文性,忽视了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之间的权力等差异。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语言的结构、语言逻辑主义的破除,以及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等原因,翻译研究开始深入到文本的社会性与文化性的发掘。这引领着翻译研究者更深入地探讨如何处理和对待文化差异的问题,翻译研究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翻译的文化学派。文化学派的学者主要有埃文-左哈尔、巴斯奈特、勒弗菲尔、图里、赫尔曼斯、尼兰贾娜、西蒙、韦努蒂等。学者们从多元文化理论、后殖民理论、解构主义、女性批评、“食人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许多学科的角度把文化纳入了翻译研究的整合过程去探讨文化翻译。巴斯奈特和列费维尔于1990年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文化翻译观”,认为翻译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一种跨文化的转换。巴斯奈特提出,翻译研究方法应该把翻译单位从人们所接

\* 曾文雄,男,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在读博士生,广东商学院外语学院副教授,全国译协、全国语用学协会、广东翻译协会会员;研究方向:翻译学,语言学与语言哲学;通讯地址:广州市海珠区赤沙路21号广东商学院/广东法商大学外语学院,邮编:510320。

受的语篇转移到“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这打破了传统的翻译研究观念,把翻译研究带入一个新的阶段。文化转向的翻译观强调:翻译应以文化为翻译单位;翻译更是一种文化交际的行为;翻译应注重对原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权力、社会意识形态、政治、赞助人的力量、历史、诗学等被纳入文化转向研究的大环境下,强调这些因素对翻译的制约。面对翻译的文化转向,我们面临着如何突破语言障碍,实现并促进文化交流与跨文化信息传递的难题。

关联理论与顺应理论都强调人的认知作用在交际中的重要性,并强调交际是动态选择的过程。语言的理解和使用是一个顺应关联的过程,即语言的选择和运用是交际双方寻求关联、顺应关联的过程。关联顺应包括八方面的内容:(1)语言使用的动机是交际愿望;(2)话语交际的目的在于寻求最佳关联;(3)说话人/译者的关联假设决定话语方式的选择;(4)关联假设也是说话人/译者顺应符合关联原则的语境的结果;(5)该模式的语境包括语言语境(语音、语调、重音、词素、词汇、句子、篇章、语体)和交际语境(语言使用者、物理世界、社会世界和心理世界);(6)关联顺应就是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非语言语境)相互顺应的动态过程;(7)关联顺应过程也是语言使用策略选择的过程;(8)话语交际是在顺应关联的基础上的明示—推理过程中进行的。关联与顺应理论都有其产生的哲学渊源,经过不断的发展,它们对翻译过程中的语言使用与选择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格特提出关联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是明示——推理的交际过程;翻译本质是译者在原语认知语境和译语认知语境之间寻求最佳关联性的过程,即译者期望译语读者在理解原语时获得充分的语境效果而没有付出不必要的认知努力;翻译是一个动态的跨语际的阐释过程;翻译方法是相对的和动态的;译者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尽可能使原语作者的意图与译语读者的期待相吻合。而顺应翻译论的哲学渊源为达尔文的进化论。翻译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顺应”、“选择”、“竞赛”、“变体”、“保留”、“淘汰”等现象与操作,以期达到翻译的目的。从关联顺应与选择的视角来看,译语是译者关联顺应与选择的产物,没有译者的关联顺应与选择就没有译语。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直处在“中心”地位,起主导作用。发挥译者为中心的优势,能避开原语取向和译语取向的“两个极端性倾向”,从“原语——译者——译语”三元关系中处于中心位置的“译者视角”来考察译者在文化转向与文化翻译中的主导行为,使原语与译语在文化维/层面获得最大的关联性与最佳关联性,顺应翻译的目的与翻译的生态环境。因此,关联顺应与选择模式下的翻译活动的动态过程可描述为:译者与作者、原语文本相互顺应与选择,最佳关联的意义(主要是文化维度)选择——选择意义的转换,灵活性策略地顺应与选择——明确翻译目的,选择关联顺应的对象或层面——相应的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多维的顺应性选择转换。

### 3. 关联顺应选择论对文化翻译的解释力

#### 3.1 翻译生态环境下文化翻译的任务与解读

文化翻译的任务不是翻译文化,而是翻译容载或蕴涵着文化的信息的意义。文化与翻译的宏观研究体现在:文化交流必须通过翻译,没有翻译就没有交流。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两种文化在交流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微观的角度的文化与翻译表现在:文化翻译主要探讨哪些文化因素制约和影响了翻译。文化翻译可分为广义文化翻译和狭义文化翻译。宏观的、广义的文化翻译含盖容载一切文化信息的意义转换,其中包括语法意义,主要关注英汉语言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狭义文化翻译指词汇、词组、句子、语段、篇章、风格和语言文化心理等层面的语言意义,狭义的文化意义可以通过映射、投射、折射、影射获得。

最佳的文化关联顺应性是解释文化翻译的有效途径。文化关联顺应性涉及的要害很多,它能从动态性的视角分析人文语境下的篇章情景转变、话题转变、情态转变、句法结构转换、词语语用转换、语种转换、文体或风格转换、读者对象的转换等等。译者担当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从原语的文化与译语的文化两个极取得文化关联顺应,平衡两极的文化并进行转译。翻译的最佳关联性与顺应性强调译者在理解原文时要做出适当的处理努力来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推理出原作的文化信息,并对译语接受者的认知语境做出正确的假设,从而选择适当的译文,努力使原语作者的意图与读者的期盼相吻合。原语往往有其明显的文化标

记,折射出明示或暗含的文化信息,通过翻译生态环境下原作、译者、译文、读者、社交、认知、心理等多元关系的关联,译者可以获得最相关的语境假设,使译语体现出翻译的根本目的——传递异国文化带来的审美价值。审美价值的体现主要为译语中应保持原语文化的异域感和新鲜感,同时由于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语言之间的翻译会出现文化信息传递的障碍,翻译任务要求我们应弥补“文化亏损”(culture default)以减少译文中交际意图的文化亏损。对于文化亏损的问题,译者可以在关联顺应模式下对译语进行选择,采用灵活方式处理原语的文化。例如:

(1) 宝玉道:“一言难尽”。说着便把梦中之事说与袭人听了。然后说至警幻所训云雨之情,羞得袭人掩面伏而笑。(《红楼梦》)

“It is a long story”, answered Pao-yu, then told his dream in full concluding with his initiation by Disenchantment into “the sport of cloud and rain”. His-jen, hearing this, covered her face and doubled up in a fit of giggles. (杨宪益译)

(2) 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译文 1: Pao-yu has first taste of love

Granny Liu pays her first visit to the Rong Mansion (杨宪益译)

译文 2: Jia Bao-yu conducts his first experiment in the art of love, and Grannie Liu makes her first entry into the Rong-guo Mansion. (D. Hawkes)

“云雨”指男女合欢。自从战国时期宋玉《高唐赋序》言楚王与神女相会高唐,神女自谓“旦为行云,暮为行雨”之后,“云雨”便成了男女性关系的委婉语。例(1)译文杨先生将其译为“cloud and rain”,显然译者采用了异化策略,想把中国的文化传播给外国的读者,但“云雨”的英译很难让读者能将其与性关系联系起来。例(2)的译文中译者采用了“taste of love”与“the art of love”,或者也可以用“love-making”、“the love making spot and cloud and rain”等来翻译,应当说这些译文都传达了原语的信息,达到了交际的目的。在翻译生态环境下译者解读了原语的文化含义,并考虑到翻译的交际任务,顺应了读者的认知语境和反映。但传统的中国文化赋予“云雨”的文化意蕴却不复存在。为此,译者应选择相应的语言形式和相关的翻译策略,如采用夹注或尾注等方式对原语文化进行传译。

### 3.2 关联顺应与选择过程中译者的中心地位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提出,译者的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也就被提出来。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原语——译者——译语”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是主体,是翻译过程的中心,原作者、原语是他的前在客体,译语和读者是他的后在客体。译者的文化取向和文化身份的发挥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前者和后者的客体,但译者通过其“中心”地位能跨越了两种语言的障碍,取得相应的语境关联与顺应,策略性的优化语言连接了前客体与后客体的时空,使原语和译语的主体性融合在一起。译者为中心的文化翻译过程是一个关联顺应的过程,两种文化在译者这一文化的中介中得到协商。译语的文化既是译者“侵入”原语,置身于“文化语境”创造性解读原语的过程,也是不断做出协商与选择的结果,最终求得译者与读者的对话。例如:

(3) 金蟾啮锁烧香人,玉虎牵丝汲井间。

译文 1: A gold toad gnaws the lock. Open it, burn the incense.

A tiger of jade pulls the rope. Draw from the well and escape.

译文 2: Round the golden-toad lock, incense is creeping;

The jade tiger tells, on its cord, of water being drawn.

译文 3: When doors were locked and incense burned, I came at night;

I went at dawn when windlass pulled up water cool. (胡庚申, 2004)

本诗为晚唐李商隐《无题》中的诗句,描述的是诗人赴情人处语境约会的情思。这两句词具有浓厚的文化隐含。“金蟾啮锁”是中国古代富贵人家的门环,这里用门环指代门。根据唐代风俗,早晚要烧香敬

天地；“玉虎”是唐代富贵人家水井辘轳上的装饰物；“牵丝”就是拉井绳，唐代人民有起早打井水的生活习惯。要把原语的文化体现出来，译者无疑要发挥其主导作用，“侵入”原文，取得与原文文化的关联，才能理解原语所含的文化信息，以最终能对文化进行有效的转译。译文（1）几乎是字对字的翻译，译者没能把握原语的文化隐含，没有很好译出原语的文化信息。译文（2）译出了原语的信息，但没有传递原语的文化信息，读者难以获得与原语文化相关联与顺应的认知假设与信息。译文（3）传递了原语交际的意图，体现了译者在强调文化因素传递的同时并没有忽视译语的交际性，顺应了读者的认知语境。

### 3.3 最佳关联顺应的维度

翻译视角中的文化视语言为文化的主要表现手段，对文化的意义、意向、审美进行文化解码，在微观和宏观的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进行逻辑校正和跨文化调节下译文表达的文化交流。在关联顺应与选择的翻译模式下讨论对文化、语言、交际等要素的转换，首先我们要注意要转换的两种语言的共性存在外，更需探求与比较两种语言的异质性。语言的异质性导源于文化差异的存在。为实现翻译的本质目的，译者必须在以价值观点、审美取向、思维方式等文化因素为取舍的先决条件下操作翻译过程，力求“求同存异”。范东生（2000）提出译者要注意不同层面的文化交流，即文化表层交流：这是一种横向移植，指符号层面的转换；文化深层蕴含的转译：指转达内涵的文化价值。中西文化差异体现在价值观念的差异、家族观念的差异、生活方式的差异、民族色彩的差异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等等。此外还有影响翻译的语言因素：文化间的，包括文化词语、审美差异、政治影响、道德观影响；以及文化内的，包括翻译策略倾向、写作的时代风格。刘宓庆（1999）认为，文本文化的解读必须以语义文化诠释为基础，同时要兼顾各式各样的文本，各式各样的接受者（译者和读者）以及交际目的等。我们认为，文化翻译总是建立在中多维度上进行的，对词语意义的文化诠释及对文本的组织结构或层次的解析和文化解读，以获得最佳的关联顺应性。译者不仅要考虑译语文化中的翻译政策，即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政策，而且要考虑译语文化所倾向的作者、作品时期、文本类型、流派以及翻译过程的文化语境。同时注意文化心理方面的文化关联顺应与选择。文化心理系统包括（1）文化价值次系统：人生价值观、自然价值观、道德价值观、知识价值观、经济价值观和审美价值观；（2）文化行为次系统：非意向行为和意向行为；（3）文化表现法次系统：谚语表现和非言语表现。

对文化成分的翻译原则主要取决于原作的文化背景、原文作者的权威性、翻译的社会背景、翻译的发起者和译者的文化观念以及译文读者群的文化接受心态等因素。文化成分处理的模式有：文化直入、文化阻断、文化注释、文化融合、文化归化等。但笔者认为，不管采用何种文化翻译模式或原则，文化关联是准确理解文本文化的基础，是文化翻译的关键所在，而文化关联的真正的主体为译者。文化信息的载体体现在词汇、翻译的场景或背景、事件或过程、气氛和情态、人物文化特征、叙事行文风格等，译者必须把这些信息整合，以确保译语尽可能充分地表现原语的“原汁原味”。在处理原语的文化过程中，译者应从上述多维的文化差异入手，建立多维文化层面的关联顺应与选择，在双语间取得文化的平衡选择。这要求译者与原文的作者取得关联顺应，以及在思维上的关联、价值观念的关联、审美取向的关联；取得与目标读者、目标读者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取向和期待视野等等方面的关联顺应，以获得共同的文化预设的关联顺应，让译语的读者获得同样的联想。下面请看文化维中的意识形态在关联顺应下的处理例子：

I had not known you a month before I felt that you were the last man in the world whom I could ever be prevailed on to marry. (Austen, 1958:193)

我还没有认识你一个月，就觉得像你这样一个人，哪怕天下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愿意嫁给你。（王一科，1956：227）

王一科对伊丽莎白的诠释顺应了当时占主导的意识形态，他把伊丽莎白当成被压迫阶级的代言人，让她更像正义的化身，采用了归化策略，其译文归化于汉语的文学传统和语言习惯，也归化于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观。

### 3.4 策略性译语优化的选择

关联顺应与选择的翻译观能从综观的视角解释语言使用，从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宏观和微观审视文化的

顺应性选择转换。文化关联顺应性也要求译者取得最佳关联顺应与选择。在通过文化关联顺应而获得文化翻译的表现(译文)的翻译过程中,文化翻译必须体现文化顺应性原则,翻译的文化信息应该顺应译语的文化现实和文化发展的需求;忠实于原文的文化信息和语义信息;符合原文和译文的审美观。同样,从译语的文化接受性来看,使翻译的语篇接受者只付出极小的处理和努力就能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来理解译文。这就要求译者要把原文的语言信息和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转换出来,而不是照搬翻译,否则难免出现文化缺损。中英语言文化的差异给翻译带来一定程度的障碍,但同时也决定了翻译策略的灵活性。翻译策略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交际意图,译语正是顺应交际意图与读者期盼,成功地使原语交际者的目的与译语读者的期盼在认知语境上相吻合。

影响和制约译者的翻译策略的文化因素有:译者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取向、译者翻译一部作品的目的、译者的目标读者、目标读者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取向和期待视野、译语文化中的文学传统、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之间的相对地位以及翻译活动与译语文化之间的活动关系(孙会军,2000),同时还包括赞助人的力量、意识形态、诗学等等。由于文化差异,这导致在翻译原语的文化时,不可避免在进行文化杂合,以达到某种平衡和均势,这也迫使我们必须取得与文化关联顺应与选择,对文化进行挪用。尽管文化价值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会发生变化,要充分传递原文的文化也比较难操作,但通过译者对原语文化的关联顺应与选择,对原语进行编码和解码,选择灵活的翻译策略,尽可能地对原语文化的进行合理的改造,这样在尽可能保持原语文化的同时也可以减少原语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避免译语走向极端,正确地达到翻译的目的。例如:

(4) Every party has a wet blanket; Susana complained all night at my birthday party.

译文1:所有的聚会都难免会有扫兴者;你看苏珊,她在我生日晚会上一直怨言不断。

译文2:所有的聚会都有像湿地毯一样令人扫兴的人;这不,苏珊在我生日晚会上抱怨了整整一晚上。

这里的“a wet blanket”是个文化隐喻。译者必须通过文化关联才能获得其真正含义:因为湿地毯用于扑灭刚燃起的火苗效果极好,所以英语中用它来比喻那种扑灭别人热情或破坏兴致的人。译者必须根据关联获得的信息顺应读者的审美观,对原语的文化进行策略性的处理。译文(2)虽然对原语文化进行了“补偿”,但仍然令人困惑:为什么湿地毯是令人扫兴的呢?在这样的情况下,译者需要顺应翻译的目的,运用“转换补偿”的策略,把文化隐喻进行关联转换,用“扫兴者”转译“a wet blank”。

#### 4. 总 结

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转向”并不是翻译研究的全部方向,它只是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同时,我们应当警惕用文化研究取代语言研究,而对这些文字即文化研究对翻译本体研究的剥夺,把翻译本体研究消解在文化研究中。我们要充分认识文化的本质,从文化交流与发展的高度来理解翻译活动;明确以民族文化为立足点,充分注意到维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防止“文化霸权主义”的倾向。同时,译者必须发挥翻译三元关系的主体作用,强化主体的文化意识、文化信息感应能力与判断能力,提高整个翻译的综合能力,对文化的翻译做出合适的关联顺应与选择。

#### 参考文献:

1. Bassnett, Susan &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C]. London and New York: Printer Publishers. 1990.
2. Lefevere Andre. *Constructing Culture: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8.
3.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London: Arnold. 1999.
4. 刘宓庆. 文化翻译纲要[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责任编辑:范 群、李 霄、甘艳芬、胡 雯)